

KANGZHAN WENHUA YANJIU

抗战文化研究

【第八辑】

李建平 张中良 / 主编

本丛刊以传承抗战精神、
铸造中华国魂为宗旨，以发掘抗战文化史料、
研究抗战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当代价值，
探讨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为重点，
以期将抗日战争研究和抗战文化研究推向深入、迈向新境。

研究抗战文化
传承抗战精神

国魂所系
心向力行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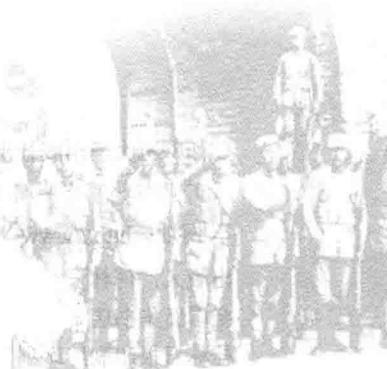
【第八辑】

KANGZHAN WENHUA YANJIU

抗战文化研究

李建平 张中良 / 主编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 / 选编
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战文化研究. 第 8 辑 / 李建平, 张中良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495-5514-7

I. ①抗…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抗日战争—
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K2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056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4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600 册 定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承蒙
广西社会科学院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精品项目资金资助出版
特此鸣谢

目 录

- 历史当代性研究**
- 纪念抗日战争之当代责任 李建平/1
 - 从广义文化角度解读朱德的抗战思想 王盛泽/5
 - 从多元价值维度体现看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的独特性及其“申遗”的可行性 韩继伟/13
- 思潮与运动**
-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中央研究院 张凤琦/22
 - 试析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宣传活动及策略
——以广州《华侨战线》为中心的考察 张秋菊/36
 - 延安文艺中的农民形象 吴继金/50
 - 三十年代《日本》杂志研究 时培磊 李 辉/60
- 人物研究**
- 范长江：国统区开创红色新闻宣传第一人 文丰义/74

艾青抗战初期在武汉的诗歌创作与文化活动 章绍嗣/88

徐特立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王 倩/96

陈寅恪抗战期间与云南的缘分 杨立德/107

父亲、驼龙传奇与梅娘的日本初认知

——试论梅娘家族与日本的渊源及对其文学活动的影响

陈 言/118

武汉抗战文化人物二题 倩 磯/128

文本论析

路翎小说的抗战叙事 张中良/137

抗战文学与徐州会战

——以《文艺月刊》为窗口 赵 伟/152

漂泊体验与冯沅君抗战时期的文学书写 杨华丽/160

远征异域的文学记忆

——西南联大从军师生的战争书写 董晓霞/178

抗战艺术研究

抗战时期桂林抗战艺术理论初探 李建平/192

桂林文化城抗战漫画研究 张明学 吴祖枝/199

史东山抗战电影的建树与特征 邵瑜莲/212

西风拂面

——西方现代音乐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传播 陆 瑶/223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文献资源补充与采集策略研究

——基于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的思考

王祝康 王兆辉/235

构建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的探索与思考

王兆辉 闫 峰/243

桂林博物馆藏抗战文化城文物资料综述 洪德善/250

老河口市博物馆暨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部旧址概说

杨 柳/264

史料与书评

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抗战画册撷萃 万华英/274

《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号外评析 陈桂香/283

抗战时期的“历史上的今天”

——抗战期间《文化先锋》上的“建国历详解”栏目 洪 亮/288

抗战时期旅桂文化名人在桂住址调查 魏华龄/293

文学对历史的承载与超越

——评张中良著《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熊 辉/303

《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评述 魏华龄/312

研究档案库

抗战时期广西出版物与抗战史料保护利用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314

“中国知网”《抗战文化研究》发行与传播统计报告(2012年度)/319

后记 /322

关于编辑出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论文集”和《抗战文化研究》第九辑征稿启事 /323

关于稿费支付的声明 /325



历史当代性研究

纪念抗日战争之当代责任^①

李建平

[摘要]在举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广泛和大规模地宣传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成果和重大意义，应该全面调查和整理现存抗战遗址、抗战文物、抗战档案并进一步加大保护利用力度，应该加紧开展对抗战老兵的援助和影像资料的采集与整理，应该进一步引导和推动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影视制作，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活动，推动国际性和平正义事业发展。以此达到牢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的目的。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代责任；抗战遗址

2014 年 2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将 9 月 3 日确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议。纪念抗日战争，是当代中国应有的责任。在举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

应该更广泛和大规模地宣传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成果和重大意义。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反抗外敌侵略全面性胜利的伟大战争，是中华民族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 100 多年由衰弱挨打到刚强站立起来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大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和象征。其成果之辉煌，其意义之重大，多年来似乎已讲了很多，其实在民众中并未讲够讲透，甚至在史学研究、国民教育、党史研究等国家规范渠道均没有准确体现，至少没有充分体现。究其原因，主要的一条是我们在 20 世纪下

^① 本文 2014 年 8 月 27 日在《人民网·理论频道》发表时标题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我们应当做什么》。

半叶的一段较长时间里,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将阶级斗争的胜利掩盖了民族战争的胜利;讲阶级斗争、解放战争的历史、战果和意义多,讲民族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历史、战果和意义少。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后来的几十年全力地搞经济建设,顾不上对思想道德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错谬与混乱作清理与反拨,致使上述的一些带有较大缺陷的历史观继续在思想领域延续。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使这段历史在中国民众中甚至世界范围内逐渐淡漠,战争的正义性和重要性没有很好地张扬,战争肇事者的责任不能清晰彰显。这在客观上让日本右翼势力有可乘之机,在其国内全面抹杀战争罪恶和责任,并挑起国际性争端,挑战亚洲和平秩序和世界进步阵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与性质的共识,直接威胁我国的周边安全和国土利益。在这个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议,从法规层面上确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并将其重大意义带入民众的生活与意识之中,带入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之中,意义重大。为此,我们必须从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开始,更广泛和大规模地开展宣传抗日战争胜利伟大成果和重大意义的工作,包括国际性宣传,科学、规范、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遭受的重大战争损失和取得的重大战果,宣传中国人民开展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重要性,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建立战后世界和平秩序的重大贡献。党委宣传部门、政府相关机构、新闻媒体、文博与社科事业单位、党校、高校、中小学校、社会团体等,尤其具有重要的宣传责任。要提升宣传高度,扩张宣传广度,增加宣传频度,推进历史研究深度,创新宣传与研究的手段与方法。真正使对这个伟大节日的纪念达到“牢记历史,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们,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的目的。

应该全面调查和整理现存抗战遗址、抗战文物、抗战档案并进一步加大保护利用力度。抗日战争结束将近70年了,战争的遗迹大多已湮没消失。现存抗战文化遗产,如民族魂魄,如国家瑰宝,弥足珍贵。保护好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并付出重大牺牲取得的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的胜利成果,是保护我们

国家和民族的重大财富,是保护我们民族自身的脊梁与血脉,是我们后人的重大职责。此时此刻,抓紧保护现存抗战文化遗产,刻不容缓。抗战文化遗产,从物质层面说,至少有抗战遗址、抗战文物、抗战档案三大类。政府应该立即启动全面调查整理现存抗战遗址、文物、档案的工作。目前虽然有一些地方政府和一批机构、社会团体和民间人士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重庆市启动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广西社会科学院和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联合开展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中央档案馆、国家第二档案馆以及一些省级档案馆的抗战档案展示,四川企业家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的建设,等等,但毕竟还不普遍,不够全面系统,力量也很单薄,其单方面的成果还无法充分整合,提升价值,难以对国家战略起到强力支撑。因此,由国家层面设制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包括文博、档案、图书、社科、党史、地方志等领域开展对抗战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和整理的系统工程,应该是当下立即开展的工作。在开展调查整理的同时,加大保护力度,包括制定保护政策,落实保护措施,增加保护的资金配置等。

应该加紧开展对抗战老兵的援助和影像资料的采集与整理。抗战老兵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又是这场正义战争的贡献人,理应得到尊重与关照。历史过去了 70 多年,生存在世的抗战老兵已经越来越少,更显珍贵。这里所说的抗战老兵,主要指原国民政府军的抗战老兵。因为原共产党所属部队的老兵即八路军新四军老兵,在新中国里一直得到较好的待遇与照顾,而原国民政府军老兵没有得到同等待遇。如今他们已年迈体弱,大多生活困难,精神窘困,亟须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予扶助。扶助或者说援助这批抗战老兵,既符合当今全面肯定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全民性的国家意识,也是我们抢救活的历史资料,掌握活的历史证据的国策所需。一个抗战老兵是一座活的抗战博物馆,开展对抗战老兵影像资料的采集和整理工作,是对抗战历史的有效开掘和对历史文物的新的保护手段,是将精神层面的抗战文化遗产转化为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应在政策、宣传、生活补助、医疗保障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这项工作如今也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应该进一步引导和推动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影视制作。近十年来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和较深入的学术成果,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层面上对抗日战争的高度重视和准确认识。要保证准确的历史观、战争观对国民思想的正确引导和对抗日战争历史、成果和重要性的正确宣传,还需继续推动社科界、党史界、文化界对中国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入研究,包括科普研究和文艺创作。加大对有关抗日战争社科研究成果的出版推介和成果转化工作及其扶植力度,鼓励作家艺术家在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掌握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开展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影视作品的创作。近几年虽然出现了一批粗制滥造、被人诟病的抗日影视剧,但这并不是摄制抗日影视剧的必然弊病,我们依然有着像《亮剑》《悬崖》《潜伏》《太行山上》《东京审判》等一批优秀的影视剧,为此我们也更需要以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历史观加强对文艺创作和影视剧生产的引导。今后要进一步引导和推动社科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在正确的历史观和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产生更多优秀社会科学著作、文艺成果和影视作品。

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活动,推动国际性和和平正义事业发展。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府派出十余万远征军赴缅作战,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以巨大的牺牲和卓越的贡献赢得了战后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位置,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我们举行首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纪念活动的时候,应该秉承当年加入世界进步阵营的传统,积极参与世界性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相关活动,尤其是明年的世界性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俄罗斯和韩国时已与两国总统约定明年联合举办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这是我国参与世界性纪念活动的重要一步。这将扩大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宣传,扩张我国对世界和平正义事业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扩大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声音与势力,挤压少数抹杀战争历史,企图逃避战争罪责的不认错国家,促其反省。中国应当而且可以为世界和平正义进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

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抗战文化。

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国水旱灾害频发，资源匮乏，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人民生活困苦，民族矛盾尖锐，中日冲突日益加剧。

从广义文化角度解读朱德的抗战思想

王盛泽

[摘要]从广义文化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朱德的抗战思想进行一种新的审视和解读，它决定了中国抗战的持久性和全民性；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探索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中国正义战争的必胜性。

[关键词]朱德；抗战思想；广义文化

一、从文化的发展阶段看，战争是两种文明的剧烈冲突，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它决定了中国抗战只能是持久战、总体战

对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辞海》的定义是：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陈华文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了维护人类有序的生存和持续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成果。^①可以说文化是一切社会发展的集成，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发展所继承和保存下来的状态。文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受不同阶段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制约。人类的活动只能局限在当时的发展阶段，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朱德的抗战思想就是对于这种阶段的深刻把握。他通过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等进行分析，明确了抗战期间中国文化发展处于哪个阶段，提出了中国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正确认识。从总体上说，与日本比起来，中国还是一个弱国，军事技术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朱德从中国和日本两国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状况对比入手，分析出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批驳了“抗战必败”的论调和“唯武器论”者的错误认识，指出：日本资源缺乏，人口又少，所以并不是那么可怕。抗战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抗日游击战争是“时代的产物”，但抗战将是持

^①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13页。

久的、艰苦的。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因为中国可以在持久战中，以空间换时间，从而实现强弱的转换，最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朱德是著名的军事家，非常善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和总结战争的历史经验，他坚持认为抗战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这一点必须毫不动摇，同时强调进行人民战争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必要条件。他指出：“我们用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主要因素，乃是政治上的理直气壮和人力方面的无穷源泉”，“所以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弱国要战胜日本这样的强敌入侵，就必须发动广大民众进行人民战争，中国的抗战不仅要靠几百万的军队，更主要的还是要依靠成千上万的民众。没有民众的支持和帮助，抗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正因如此，他强烈主张在中国要开展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要加紧武装民众，实行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同时对那些害怕民众起来、总是想方设法压制民众，企图单一依靠军队实行片面抗战的错误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动员民众参战，实行全民抗战，只会提高国民政府的威信，增强抗日的伟大力量，使持久抗战具有更加强大而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朱德的抗战思想最鲜明的体现就是他的抗日游击战争思想，在战术上表现为抗日的大众战和民兵战，“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不过它是群众抗日战争的一种最高方式罢了。”朱德虽然认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因素”，但“人的问题是决定战争最后胜败问题”。这里所指的并非作为个体的某个人，而是指社会的人，是社会人的总体的集合。当时我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4，等于日本人口的7倍以上，“这是我们制胜的最重要的条件”。“持久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去团结这庞大无比的人力，并很好地运用它。”因为抗战是一个持久战、总体战，“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

朱德提出：游击战争“要能完全适当地运用和发挥上述五个要素，但因为游击队在某些要素上特别薄弱，如武器方面的低劣不精、经济方面的极端困难，所以更要善于发挥五个要素的特质，从而有针对性地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适当地运用它们，才能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以战胜敌人”。因此，朱德将抗

日游击战争划分为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来进行论述,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概而言之,就是要运用总体战的思路来进行这场战争,才能赢得胜利。为此他主张要形成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军三者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主力必须与地方军、民兵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更强大”,而“广泛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民兵,是坚持敌后抗战中配合与补充正规军,保卫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基础,是支持敌后长期浩大战争的最雄厚的后备军”。从地域文化出发,朱德对以华北为中心的抗战进行了论述,给予充分重视。他指出华北从来是中外民族斗争的主要战场,形成了一种伟大的民族风格,即“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具有很深的民族意识。“这种具有很深深民族意识的广大人民,便是坚持华北抗战、进行广大游击战争的无限源泉。”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和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书记,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及主力,转战山西并指挥华北抗战,与山西人民一起度过了充满硝烟的峥嵘岁月。他在一封电报中提议:山西的发展前途,应以山西人民、地形、交通诸具体情形及华北大势来做一总的估计,“应有决心争取晋东南两大山脉,将巩固游击区,使入晋敌军陷入我群众重围中”。

从总体战出发,朱德倡导军垦屯田政策,坚持自己动手,动员、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经济困难。自力更生,发动军民生产运动,各地方政府设法帮助人民,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军民相互帮助,努力增加生产,以求达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他还具体指导了南泥湾的开垦工作;帮助陕甘宁边区解决资金和技术困难,发展边区经济。同时提倡节约,节省开支。朱德提出:抗日游击队要取得当地民众经济上的援助,同时要节省,过艰苦的生活。这种刻苦生活的模范作用,“往往成为决定抗日游击队前途的主要因素之一”。

抗战期间解放区战场的经验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在八年抗战中创造了抗日游击战争中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鼎力支持和协助,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鼎力支持和协助。这种战争不仅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更是军队与民众万众一心实行的总体战。

二、从文化的发展特性看,它宽广的包容性和不绝的继承性、创新性,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探索符合实际战略战术的极端重要性

文化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特征,但这种阶级性又不是绝对的,在

特定的历史阶段,这种阶级性是可以让位于民族性的,如在外敌入侵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其阶级性和民族性也有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宽广的包容性就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决定了中国抗战一定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实现团结抗战。因为在日本的侵略下,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只有抗日救国,才能挽救民族灭亡的命运。

朱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推动者和维护者,不仅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极为赞成,而且身体力行。在卢沟桥事变前,1936年9月18日,在一次党的会议的讨论中他提出:统一战线和各个工作部门都有密切关系,要把一切视线都引到这方面来,要首先说服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重视统一战线。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群众的政治中心”,在爱国家、爱民族的大义下,把各党、各派、各阶级、各宗教的同胞团结和组织起来,为祖国的存亡而战。他认为,在日本加紧侵略,亡国危险即将降临在每个中国人头上的时候,必须牢记“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不管过去有着怎样的深仇积怨都应该抛开,唯有摈弃前嫌,放下私人恩怨,团结一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才是出路。他提出要真正做到“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枪炮出枪炮,真正团结得像同胞兄弟一样。当然这种统一战线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他强调应“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

朱德以民族大义为重,模范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团结国民党友军共同抗日。朱德曾任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利用这一身份,对阎锡山和其他高级将领做统战工作,常到晋绥军和川军部队中做政治、军事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朱德还以实际行动,协助友军抗战。在忻口会战期间,在卫立煌所部面临危险的紧急关头,他电令八路军部队从侧翼切断日军的交通线,对日军造成极大威胁。此举令卫立煌深为折服,此后卫立煌不仅与八路军协同作战,而且多次支持枪支弹药,形成国共军队合作抗日的良好局面。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在1938年5月曾指出:在世界大潮流中,民族冲突大于阶级冲突,中心工作还是统一战线,要用一切方法巩固统一战线。因此朱德也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了坚决还击,用斗争方式教育并促使他们重新回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同时提出希望美、英、苏等盟国能加强对华援助。他努力与国际友人沟通,做好争取工作,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文化还具有累积性和继承性特征,一种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累积继承,一种是对外来文化的累积和继承,最终通过连续的文化累积和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学习实现文化的创新。朱德既重视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又特别重视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如在战略战术方面,他要求战争指导者一定要从战争的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找出隐藏在战争背后的内在规律,从而实现正确的战争指导。抗战期间,朱德根据总体上是持久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结合抗日战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指导原则。比如坚持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坚持战略的持久战、消耗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歼灭战,坚持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统一,根据需要灵活使用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等作战形式等。在从土地革命战争进入抗日战争后,从内战转到民族战争。面对日本军队,他不墨守成规,善于随机应变,求得主动,一再强调要“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朱德特别注重抗日游击战在抗战中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也注意到历史的继承性和与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性,“现代的抗日游击战争,其反抗性和一些战法的原则(如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之类),是与历史上的许多游击战争大致相类”。但又大不相同,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应从现代的游击战争中,甚至从普法战争、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中,从中国十年来的国内战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吸收各国的军事理论与经验”,“在新的条件下加以研究,使之完全适合于全国一致抗日的新条件”。总之就是要做到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因为“战争诸要素不断发生变化,作战方式也随之不断变化”。当然游击战只是起配合作用的,正规军也可以开展这种游击战。无数游击队的不断活动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所有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起行动起来,最终就能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这种游击战还是要向运动战发展。“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者的配合,是战胜敌人所必须采取的战法”。朱德特别强调要使每一个战士能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技术,“务使物有所用,人与技术密切结合”。把旺盛的土气同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提高军队士气,提高作战能力与信心。

三、从文化的发展趋向看,先进文化必将战胜落后文化,中国抗战将激发起全民斗志,决定中国必定取得最后的伟大胜利

文化具有时代性特征,这使不同的文化具有可比性,使文化有先进与后进

之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先进的文化必将战胜落后的文化。文化的时代性也决定了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发生转化的。虽然有时物质文化暂时落后，但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如精神或制度文化层面来弥补，从而使它具有更大的先进性。从文化的发展趋向看，中国抗战代表着先进文化一方，这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一是中国抗战是正义性的事业。朱德认为，中国虽然是弱国，但所进行的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政治上是理直气壮的，得道多助；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战争，失道寡助。所以中国抗战得到全国人民的全力拥护和支持，得到海外炎黄子孙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世界上坚持正义国家的大力支持，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二是抗日战争除了军事上的对抗外，更表现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坚定地维护了全民族利益，所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虽然日本在军事力量上远较中国强大，但政治上却处于劣势。三是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力量得以不断壮大，对抗战起到政治领导和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文化认同，可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相同的思维模式、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语言与风俗习惯，可以形成巨大的认同抗异力量。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抵抗外敌的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外族入侵，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凝聚力也表现得更为强大。朱德非常重视挖掘和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抗战的重大作用。他极为重视战争的政治因素，认为一切战争都具备政治因素，没有政治因素的战争是没有的。应当认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抗日的政治战争，就是要努力揭破敌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华民族以华治华的阴谋，要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归纳出政治战争就是要达到“巩固自己、团结群众、瓦解敌军”三个目标。只有完全站在保卫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求得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最后胜利，才能团结成为坚强的队伍。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是千千万万最勇敢、最坚决、充满民族意识和朝气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生存，几乎是赤手空拳地起来搏斗。任凭敌人怎样凶狠，也丝毫不能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的精神，真是动天地而泣鬼神。”

朱德提出要培养和弘扬抗日英雄主义，使“每个队员都成为抱着牺牲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底的民族英雄”。他认为，八路军、新四军中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一种新英雄主义，与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同，不